

中国当代作家谈写作

十省十七院校《作家谈创作》编辑组 编

(征求意见稿·第一集)

河南师范大学函授部

1980.7.26.

编者的话

一九七九年的深秋，川、滇、黔、桂、赣、闽、豫、冀、鄂等十省十七院校的写作课教师聚会蜀中，研讨写作课的教学问题。大家深深感到，有必要编一套比较大型的“作家谈创作经验”的丛书，供社会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爱好文学的青年及在校的大、中学生学习写作时阅读和大、中学校教师教写作时参考。大会委托河南师范大学路德庆同志负责筹编这套丛书。

今年二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路德庆同志起草了“约稿信”，并根据青年学习写作的需要，拟了十二个问题，供作家写作时参考。

约稿信发出后，我们的这一工作得到广大作家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及各省、市、自治区文联、作协分会的支持和帮助。一、二百位作家来信热情地鼓励我们。更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丛书题写了书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沙汀同志亲自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并寄来了经过修改的文稿。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作家对青年一代的关心与爱护。

这套丛书按来稿先后顺序先印征求意见稿，待稿件收齐后，经过重新编排，然后交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发行。《第一集》（征求意见稿）所载的四十位作家的文稿

是五月底以前寄到我组的。六月份以来，先后将文稿寄到我组的作家（包括让编辑组选用文稿的十位作家）有：茅盾、张天翼、艾芜、姚雪垠、康濯、秦牧、峻青、吴强、王西彦、杜鹏程、方纪、王愿坚、陆地、管桦、柯灵、晓雪、田间、梁斌、黄秋耘、骆宾基、马识途、蒋子龙、高缨、师陀、师田手、王亚平、傅仇、雁翼、孙友田、韶华、张天民、邬朝祝、陈珪、李云飞、徐怀中、梁学政、任光椿、李栋、王安友、赤叶、牟崇光、任斌武、谢树、崔坪、陈世旭、俞百巍、高晓声、莫应丰、李清联、未央、周健民、凤章、刘勇、杨佩瑾、高玉宝、王树梁、樊斌、曼晴、克非、崔德志、雷加、向明、李茂荣、苗延秀、照日巴格图、李云德、胡景芳、海笑、蓝澄、杨振文、尧山璧、晓凡等七十二位。来信表示正在写，或准备写的作家有：肖殷、沈仁康、岑桑、陈学昭、孟伟哉、严阵、陈残云、欧阳山、华嘉、邢野、蔡天心、朱祖贻、李心田、林雨、胡正、丰村、金敬迈、吴运铎、柯原、刘怀章、李古北、于逢、林井然、梵扬、王书怀、任大霖、张长弓、安柯钦夫、何为、郭风、王鸿、陆俊超、黄化石、冯骥才、刘肇霖、江源、福庚、玉泉、陈淼、赵青勃、丛深、林焕平、孙健忠、周民震、理由、刘亚舟、石太瑞、王以平、任大星、刘大为、刘绮等五十一位。目前，每天都可收到作家从各地寄来的信件、文稿。编辑组计划将这些文稿分别编入二、三、四集付印。

这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河南师范大学科研处的领导和函授部的领导及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这套丛书由路德庆同志任主编，负责全面的组稿、编辑工作。负责学校所在省组稿工作的同志有：河北师范大学赵

兴明，武汉大学周姬昌，湖南师范学院张会恩，广西师范学院沈华岱，福建师范大学林可夫，四川师范学院余文秀、邓琴蓉、汤吉庆，江西师范学院沈世豪、颜长青，贵阳师范学院简发祥、任申润，云南民族学院段胜鸥、李昆华。

由于编者的水平不高，再加上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作家、读者批评指正。

十省十七院校《作家谈创作》编辑组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目 录

- 1、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沙 汀(1)
- 2、由儿时和故乡说起……………丁仁堂(9)
- 3、深埋十月 一朝萌发……………长 正(25)
- 4、丰富记忆的库藏……………杨 麦(31)
- 5、生活与创作……………李逸民(37)
- 6、学步浅谈……………王杏元(45)
- 7、从生活出发……………张步真(52)
- 8、《生活笔记》琐谈……………张 峻(58)
- 9、生活笔记及其他……………王忠瑜(64)
- 10、谈创作的准备……………玛拉沁夫(72)
- 11、观察、虚构及其他……………肖 平(114)
- 12、素材和作品间的一道桥梁……………孙 颢(121)
- 13、“以十当一”与“以一当十”……………张胜友(128)
- 14、谈谈小说《重逢》的构思……………金 河(135)
- 15、构思点点……………黄飞卿(140)
- 16、作品的形象与思想……………杨 嘉(149)
- 17、作品中的细节……………韩映山(155)
- 18、谈文学的语言……………马 加(161)
- 19、初学写作的一些联想……………叶 辛(166)
- 20、知难而进，勇于实践……………吕 梁(175)

- 21、《我的第一个上级》写作经过……………马 烽(188)
- 22、谈谈处女作……………陆扬烈(191)
- 23、《万山红遍》创作经过及其他……………黎汝清(197)
- 24、创作杂谈……………竹 林(233)
- 25、漫谈习作《小铁头夺马记》……………蔡维才(239)
- 26、我是怎样写小说的……………徐 慎(247)
- 27、生活与文学道路……………王 浩(255)
- 28、我怎样学诗……………刘 章(282)
- 62、我学习写诗的道路……………高 平(296)
- 30、学诗片谈……………王洪涛(309)
- 31、从《雪山风暴》谈起……………汪承栋(320)
- 32、创作《归来》一诗的几点体会……………李昌松(332)
- 33、从剧本《吉鸿昌》想到的……………陈立德(340)
- 34、从《中华女儿》到《烽火少年》……………颜一烟(354)
- 35、我的创作体会……………李惠文(368)
- 36、答本书编者问……………刘 真(382)
- 37、答本书编者问……………叶蔚林(389)
- 38、答本书编者问……………张庆田(392)
- 39、关于《小黑子和青面猴》及其他……………金振林(394)
- 40、答本书编者问……………贺政民(402)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沙 汀

我写过一些小说。我一直在创作上按照这一条办事：写自己所熟悉的。但是，这是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在得到一位前辈提示以后的事。初学写作的一两年，我大多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反映“时代冲击圈内”的主要生活斗争。没有这类生活，就四处搜集资料。

反映“时代冲击圈内”的主要生活斗争这个愿望好不好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对于尽力搜集这类题材，也未可厚非，但是最可靠的办法是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斗争中去。这个道理，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就已经向我们苦口婆心地讲得最透彻了。这里我只想谈谈自己抗战时期的一些有关写作的经验，至于全国解放后，怎样去熟悉新的生活，借以通过小说散文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等以后有机会再讲吧。

在全国解放以前，一九四〇年以后一个长时期内，我写的东西比较多。而且，不少东西，我大都放手而为，好象并没有花过多大气力。至少没有感到过多少苦恼。这因为我所要反映的现实生活，比较而言，对我太熟悉了。只要有点甚么有些意思的小故事、小情节触动了我，觉得可以暴露一下旧政权的反动实质，我就能较为迅速地写成一个短篇小说。

当然，由于琢磨不够，修养又较差，这也使得一些作品文字上未免粗糙。

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写作过程，因为这篇小說在当时有过一定影响，文化大革命前也受到过赞扬，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下，我却为它吃过苦头。这苦头是：有人曾经把我押解到一处镇子上去，煽惑一批农民群众大兴问罪之师，要我进行检查。万幸基本群众一般都通情达理，经我作了扼要的解釋，农民群众显然感觉我言之成理，很快就散去了。尽管随后在县城、专区的群众大会上照样遭到为“四人帮”所蒙蔽的“造反派”的“尖锐”批判，……

这也许是一点微不足道的“伤痕”；不过既然已经写上，不妨就让它留下来吧。现在且来说说《在其香居茶馆里》的写作过程。一九四〇年的重庆雾季，人们大都从疏散区搬进城，市内一般社会活动，又转入旺季了。在已故的老舍先生支持下，我们计划用“文抗”总会的名义召开一系列文艺晚会。反动派对于这一活动相当注意，在“中苏文协”举行的第一次晚会上，竟连“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也闻风而来，好象比任何参加者都积极。所以这种晚会一共只举行了两三次。

第一次晚会叫“小說座谈会”。主要内容是欧阳山同志讲抗战以来小說方面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在他的长篇发言以后，老舍先生朗诵了一段《骆驼祥子》。座谈会是我主持的，这期间，听众中递来好几张字条。其中一张的内容，大意是：现在兵役问题积弊很多，经常闹得鸡犬不宁，作家为什么不揭发？云云。此外几张字条，对作家提了些什么具体的责难、希望，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这张字条给我印象很深，它使我想起了一些有关“役政”的见闻，感觉的确应该揭露一下。我初到重庆，曾经在南岸铜元局华裕农场住过一段时间，认识一位姓陈的农艺师，合川人。一次“跑警报”，碰在一起了。闲谈之间，他告诉我，他曾经回过一次家乡，因为他一个侄儿被抓了壮丁了。但是，经过他的“活动”，又释放了。“是怎么释放的呢？”我问。

“那不容易！”对方满不在乎地回答：“晚上集合起来排队，报数时那娃故意把数目报错了。队长就说，你这样笨配打‘国仗’？快把衣服垮下来，滚！这不是就放啦！”

当一想起这个故事，一些我所熟悉的小城、小镇上的“头面人物”，都浮上脑际，似乎都准备为我的创作冲动服务。当然我也想起一般市民的生活和对此类“土劣”的态度，以及城镇生活的规律和气氛，于是，没有几天时间，由于我所要刻划的人物不断在我脑子里根据我设想的条件进行表演，《在其香居茶馆里》的构思，基本上完成了。剩下的问题是把它变成文字。这个比较容易，那时候我毕竟已经浪费过不少的纸张了。

最近，我在回答一位青年同志的约稿信上说，由于被迫搁笔十年，又受到长期禁锢，身体也逐渐衰弱，写东西不那么容易了。我还说过两句笑话，只有抗战期间，我有过类似“文思泉涌”的情况。这是指我在故乡山区睢水关生活那七、八年而言。这倒近乎事实。那时候我的生活相当别致，大部分时间住在乡下，在时局比较平静，县城里也没有关于我的坏消息的时候，我又悄悄摸回去住几天，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风声一紧，我的亲属就又催促我回到乡下。

我在睢水街上的住屋，也相当别致，是一座大院子的门

厅，间隔成为五间。而这门厅从外面看来正象一座寺庙的正门，阶沿高，门扇大。门厅后面的两栋西式楼房，早已在若干年前，当地袍哥头目的一次武装冲突中焚毁了，只剩有几处断墙颓垣，有时令人起荒凉之感。可是大门外的景色却很不错，一条宽大的河流日夜不息地就在离门阶十多步远近的老坎下流过；河的对岸，则是一片空旷的河滩、草地，零散地点缀着两三座石灰窑。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我有机会摸回去住了几天。那时候，我已经从大山区刘家沟转移到离街较近的苦竹庵了，回家相当方便。一天傍晚，我同家里人拿了桶去河边打水，发现一个“跑山河的”蹲在老坎下的河岸边，洗刷着箩筐里一个个腌大头菜。当时这一带正在“抓丁”，闹得这场镇也骤然冷落了。我忍不住惊叹道：“喝，这一向还敢出门，不怕抓你的壮丁呀？”“咋没抓哇！”对方愤然答道，一面对我扬起脸来，“你看，胡子都给我刮光了！”

原来尽管没有“挂须”，他的面貌却证明他已经远非青壮年了，因而就是抓去刮了胡子，也没有被验上，得以继续赶路，到茂县“求吃”了。我并没有寻根究底问他刮掉胡子的前后经过，当时没有这种条件；可也用不着多问。那位山河客本人情绪饱满的回答，已经把我平日的一些有关的见闻一下子集中起来，我似乎已经捉摸到一篇小说的大体轮廓了。经过一些时候的思索、酝酿，当它变成文字时我把它叫作《替身》。

从构思到完工，这篇东西也没有叫我苦思苦索，花费较多时间精力，因为它的人物和环境气氛，我都相当熟悉。那个山河客的谈话，正同华裕农场那位农技师的谈话一样，只不

过向我提供了一个构成故事的主要情节，以及对我所积累的生活起了一种触发作用，长期的生活积累则是基础。而在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兵役政策强加给人民的灾难，太深广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听见！

足以说明生活积累重要的例子还多，不妨说我的全部创作经验都可用来作证。这里我只想再谈一点《减租》这篇小说形成的起因。那是旧政权已经濒于崩溃时候的事情了，我也已经从永兴乡转移到安县、绵竹交界的板栗园，住在已故吴瑞卿同志的一间堆柴的屋子里。没有门窗，仅靠两堵墙壁、两三张木板抵御风寒；但是居停主人对我非常照顾。这是位贫苦知识分子，村小教师，解放后因为积极参加征粮剿匪工作，被伪乡长暗杀了。

我在胃出血后，已经半年多没有回过家了。又被迫抱病到永兴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儿子很想见一见我。于是，吴瑞卿同志一天去睢水赶集，下午就暗暗领了他来。正是冬天，夜里我俩爷子就面对面坐在床上，用被子捂着下肢，上天下地的谈起来。我兴趣最大的是社会新闻，这个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满足了我的要求。其中有一个情节成为我写作《减租》的核心：旧政权妄图利用减租的办法来削弱广大贫下中农对于日益迫近的解放的渴望，但是反动派彻底地失败了。

据我的孩子讲，它尽管曾经引起一些农民幻想，但是，作为旧政权在农村支柱的地主阶级却都异常顽固，而且，在大山地区，他们玩的花样更多。因为曾经在刘家沟住过一段时间，我对山区的租佃关系有一定了解，还认识那一带地方的好几家地主。甚至远在青少年时代，我就知道他们了。正因为如此，我也较为顺利地在不长的时间内写成了《减租》。

借以暴露旧政权面临覆灭的命运时还在继续对人民制造灾难。当然，写好后，我照例总要搁上几天，改它个两三次。

十分明显，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我所选择的生活道路比较轻便，没有长期投身到党所领导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去，因而我在那一段较长时间内写的东西，尽管从数量说，较之我这以前和这以后所写的作品为多，但却绝大部分限于讽刺暴露“国统区”官僚、地主的残暴。我说绝大部分，因为我也一再试图反映人民的反抗，而且试图突破我生活于其间的那个环境，扩大眼界，从“时代冲击圈内”取材来反映主要现实生活斗争。

这里，我想起了我另一个短篇《意外》，它的写作过程，多少可以说明我上面提到的问题。当其反内战反饥饿的革命群众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在“国统区”的大中城市相继开展的时候，就连睢水那样偏远场镇上的智识界也大为振奋。因为他们同样憎恨反动派的背信弃义，扩大内战，以致“双十协定”给他们带来的改善生活的希望重又遭到破灭。在人民群众中的反应当然也很强烈，我也在少数作品中有所反映，这里我就不多谈了。

那时候，我在苦竹庵乡下也很不安静，曾经摸回家住了几天。因为我老丈母和爱人都在街上中心小学教书，她们从同事间可以听到较多消息，我也可以较快通过她们知道一些运动发展的情况。一天，我爱人的一位在重庆读书的学生，为了逃避反动派对参加运动的同学的加紧迫害，跑到睢水来了，准备回到属于大山地区，与睢水接境的故乡去。而单就这件事本身说，已经够激动人心了。

这位同学向我爱人和她的同事提供了不少第一手材料，

但我意犹未尽，又额外提了些我认为相当重要的情节，要求她约那位同学到我家里来谈。而我呢，就隔着板壁，在另外一间屋子里谛听。这一次我得到的材料更加多了，而且，不仅有重庆的，因为他在成都有过耽延，也谈到一些他在成都的见闻。我得补充一点，我这次回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爱人快分娩了，我得照顾照顾；但我很快又回苦竹庵了，准备安安静静坐下来写点东西。

因为就在那三五天内，如有神助，《意外》的构思已经逐渐形成。我把人物的活动舞台选到成都，而且就在祠堂街一带，因为青年时代我在成都几乎整整住过五年，三十年代末期和四十年代，我都经常到那条街上有名的“少城公园”喝茶，上饭馆和逛书店。在睢水定居后，我还经常有机会阅读“民盟”主办的《华西晚报》，了解一些成都的社会政治动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人物、运动发展的趋势，乃至当时的社会动态，都有我选择、概括的余地，但我应该怎样把它们串连起来？

我在这个问题上费了较多的脑筋，而帮助我脱离困境的，却是我两年前试图写它而未成功的一篇小说的梗概：一对革命青年男女在“少城公园”遭到了抢劫。这是我就报纸上一条社会新闻改造成的，因为它原本没有说明他们晚间在公园里作何勾当，我却准备把他们写成是为革命工作到公园里进行联系，因而其初误认为那批强盗是横行无忌的特务！但是我失败了。而我这次一经想起这个故事，《意外》的构思，却顺利完成了。

这显然同年龄有关，提起过去，许多回忆都接连涌上心头。那我就再说几句吧。当我在乡下将《意外》写了大部分

后，家里托我在苦竹庵的居停主人捎来口信，说我爱人“恐怕就是这两天的事了”。于是我就又带了稿子回去，一边等她分娩，一边继续写作。不上两天，她果然临盆了。那一天的深夜，等我同王大娘安排好产妇、婴儿，已经是凌晨了。

这婴儿就是我最小一个孩子。一切顺顺当当，又节约了请“稳婆”的一老斗大米^①，我真该休息了。但我相当兴奋，很想让《意外》也能顺顺当当分娩。于是我躲到另一间小屋里去，一气写完了《意外》最后一千多字。

这篇东西是我应已故靳以同志之约写的，那时他在上海为《大公报》编文艺周刊。他收到这篇稿子后的回信，至今还保存在一些老朋友寄我的书简当中。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九八〇年夏校正

①当时“国统区”货币不断贬值，一般都用实物交易。因而小城镇的接生婆接一次生，要取一老斗米作为报酬。

由儿时和故乡说起

丁 仁 堂

一、故乡是我第一生活基地

我的故乡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地方。没有高山大水，没有翠柏苍松，只有一片黑土地。树，也是少的，村中只有一棵大柳树，不管是南山北梁，老远就能看见它。村前有一条细窄的河流，弯弯曲曲。这条小河就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山水了。就是我和伙伴们的“风景区”。春天，她给了我们春天的乐趣。我们在小河的沿边上，用木棍挖“老母猪哼哼”。这是一种甜草根，洗净了泥，嚼起来，沁甜沁甜的。但是，这草根有一层黑皮，直到把一张一张小嘴唇都嚼黑才算罢休。夏天，她又给了我们夏天的乐趣。夏天的小河很热闹。各色青蛙——黑锅贴、大花鞋、黄尖子和龙王爷的小舅子——“邦当狗子”混着声叫。我们除掉用铁钎子钎它们烧肉吃之外，涨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柳条筐去打捞上游宽阔的地方窜来的鲇鱼和苦鲢子。秋天的乐趣，是在岸上黄豆地里抓住蝈蝈让它在河里浮水。冬天的小河上，是我们用竹笼滚苏雀的地方了。这条小河不光是孩子们的世界，村里的成年人也和这条小河有种种姻缘。一年夏天河里发大水，水声响了半个月。水撤下，河里忽然出了鱼，鲫鱼、鲇鱼，成

年人都提筐抱篓地来到河边，闹着、争抢着，足足闹腾了一天。傍晚，家家窗口都传出大酱炖鲜鱼的味道。这条小河好比舞台上一幅布景一样：村中许多事情，地主压榨贫农，逼婚逼债；保长骑着大马，指挥着乡丁抓劳工；不睦的邻居互相吵架；土匪抢劫村庄；恋爱、捉奸，一切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发生在这条小河边上。因而，小河便成了我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一条线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源泉。一想到小河的风光，许多往事便风起云涌地到我脑际中来。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都有自己的故乡。故乡对每个人后来所从事的事业或多或少地都产生过影响。无论是搞医学活动、当律师、研究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甚至于搞电子研究，你记忆中的故乡，哪怕是很偏僻、很落后的、也是能给你一些真切的启发。因为，不管你研究什么，政治、科学、法律……都离不开宇宙和人类。你的故乡也是宇宙的一角，也是人类组成的一部分。至于从事文学创作，故乡的一切就象宝库一样闪着光亮。搞创作的人，最初得到的生活营养就是自己的故乡。这一点，我有深切的体会。当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村里来了一户山东移民。一家五、六口人住在一间破碾房里。吃没有吃，烧没有烧，过着极端艰苦的生活。家中有一个小女孩，六、七岁的样子，小名叫玛瑙。她每天挎个破筐出去挖野菜，样子怪可怜的。一天，她突然被大户人家的狗咬伤了腿，用块破布包扎上，一瘸一拐地照常去挖野菜。当时我家也是很贫困的。可是我们当地户，粗食淡饭还是有的。母亲打发我给玛瑙家送去两碗小米饭。我把饭交给玛瑙时，她苦笑着，半天不去接。可能她认为这两碗太多了，她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去舅舅家串门。一住两个

月，回来后，再也没有看见玛瑙，她家搬了，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玛瑙这小小可怜的形象，一直存在我心里。一九五五年我开始写小说，第一篇《春夜》，就是写山东移民的。小说以玛瑙的一家为遥远的衬景，写一户新的移民在新社会来到异乡受到党的关怀，和乡亲们热情欢迎，同玛瑙一家在旧社会的遭遇做了强烈的对比。小说中的背景、生活细节、人物风貌、语言习惯都是我故乡的色彩。

嗣后，我还感到不满足。于是就直接命名《玛瑙》，又写了一个短篇。在这个短篇里，我塑造了一个青年玛瑙，还有一个青年转业军人。我写了他们之间一段纯洁的爱情。那玛瑙虽然是青年，是一个大姑娘了。但是，我寄托的形象仍然是童年记忆中的，我故乡的那个小小的可怜的玛瑙。

我上面说过，我故乡村中有一棵大柳树。前些年，我每年都要回故乡一两次。走到南山时，远远看到那柳树，我的心就猛然的跳动，因为我又回到故乡，又见到乡亲们了，激动得两腿都有点发颤。我太爱我的故乡了。它的确是我从事创作的第一生活基地。

当然，每个人的童年遭遇，每个人的故乡也是有所不同的。由于我童年时代生活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乡，以至于影响到我的作品，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没有奇山险水的风光，没有动乱的大场面，没有曲折惊人的情节。因而，作品反映出的思想力薄弱，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欠。

我真羡慕童年时代在战乱动荡的故乡里过着如火如荼的生活。在我熟悉的同志当中就有这样的。中共四平地委书记刘震海同志的童年就是在大动乱的故乡里渡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故乡是晋察冀边区，他出生在冀中平原一个叫报子营的